

世界警察特工丛书

- 世界著名大案
- 佩 瑶 编著
-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世界著名大案

奇案选

下

AN XUAN

著

世界著名大案奇案选

下

编著 佩瑶

名



D91
1001
2

二115

73743

目 录

- 一 西德政界“鼯鼠”传奇——纪尧姆间谍案…… (1)
- 二 U—2 计划之谜 …………… (23)
- 三 神秘的间谍 …………… (35)
- 四 战后西方最严重的间谍案 …………… (46)
- 五 联邦调查局发现父亲、儿子、叔父都是间谍 … (60)
- 六 美国级别最高的外交官涉嫌间谍案内幕…… (101)
- 七 秘密通道…………… (113)
- 八 风行世界的工业间谍案…………… (133)
- 九 洛克希德飞机公司行贿案…………… (144)
- 十 技术间谍的活动达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164)
- 十一 逍遥法外…………… (187)
- 十二 《希特勒日记》引出的诈骗案…………… (206)
- 十三 “琥珀房间”失踪案…………… (238)
- 十四 肇事警官巧破人体器官国际走私案…… (248)

十五	追捕贩毒大魔头.....	(282)
十六	神秘失踪的富家公子.....	(296)
十七	第三帝国的黄金之谜.....	(308)
十八	警探惊恐地发现:是她自己给自己 写的恐怖信.....	(314)
十九	轰动全美的恶性绑架案.....	(328)
二十	本世纪第一大摧花案始末.....	(340)
二十一	催命天使.....	(348)
二十二	轰动世界的凶杀案.....	(357)

一 西德政界“鼯鼠”传奇

——纪尧姆间谍案

进入 20 世纪最后一年，整个世界的面目已昨是今非，横亘在东西方国家之间的险峻高峰似乎已开始低头，而一道混凝土构筑的大墙所隔开的两个德国也已打破坚冰。然而，即使站在今天的角度去看那曾轰动一时的纪尧姆间谍案，也仍然是可以给人以温故常新的有益启示。只要这个世界上的人们还彼此存有敌意，人类的利益还要服从于各式的政治原则的时候，秘密战争就不会消亡，纪尧姆也就不会仅仅是一个昨天的人物。

1974 年 4 月下旬的各种新闻传播媒介的一个重要热点，就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总理勃兰特的高级助手京特·纪尧姆间谍案。

西德内政部发表声明宣布：“勃兰特的政治助理纪尧姆由于为东德从事间谍活动被捕。”

路透社波恩 4 月 25 日电：勃兰特总理最亲近的政治助手之一今天被捕，官方的一项声明指责他多年来为东德进行间谍活动。京特·纪尧姆（47 岁）是西德总理的私人政治助理。他是昨晚在这里的郊区寓所被捕的。由于他的被捕而揭发出西德政府心脏内有一个所谓共产党间谍网。他在勃兰特的办公室里已工作四年。司法

当局声称，他已发表声明，承认他实际上是东德人民军的一名军官和共产党国家安全部的一名特务。今天一早这个消息像晴空霹雳一般震动了波恩。政府和反对党中的政界人士担心这可能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

德新社波恩4月25日电：这里的主要议员和政治家今天在得悉勃兰特的私人助理纪尧姆因有为东德进行间谍活动之嫌而被捕后，深感惊愕和迷惑不解。西德政府发言人韦希马尔今天上午证实，纪尧姆已于星期三下午被捕。据未经证实的消息说，纪尧姆是一个间谍集团的一部分，这个集团由包括他的夫人在内的六个人组成。韦希马尔说，总理府没有其他人卷入这个事件。

随之而来，西德朝野上下乃至整个欧洲、整个世界都程度不同地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波恩。问题还不止于此，纪尧姆案件本身的含义不仅仅因为它是一桩间谍案，还因为它是涉及政府最高层的政治丑闻。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敌对势力的哪一个方面，似乎都没有完全意义的胜利者和失败者。从西德方面讲，破获这一案件无疑是有利于国家安全部的好事，毕竟置身高层政治中心的敌方间谍业已捕捉在案，纪尧姆夫妇以及他身后的间谍网络被摧毁了。然而，谁又能说清楚有多少政治机密已被纪尧姆送到东方了呢？在野党抓住这件事要挟勃兰特政府会给政情国策带来怎样的影响，也是一个未知数。这还不算，公众对政府会产生什么样的想法，对政府会有多大程度上的不信任呢？从东德角度看，纪尧姆无疑又是一个出色的秘密战士，他由于涉足于高层政治而为东德提供了大量价值颇高的情报，使东德获利匪浅。然而，纪尧姆的落网，又使得东德在西方的秘密战略严重受挫，这又不能不说是一个失败。

置身于高层政治之外或者对秘密战线一无所知的人们也许并不能理解这一事件的全部含义，以及它可能对政局所产生的震撼。

但是，善良、正直的人们一定会对一名间谍能够进入敌方的权力中心这样的事情感到惊讶不已，仅以平常百姓所能想到的程度去观察，这也是非同寻常的。

京特·纪尧姆在勃兰特总理的整体政治格局中，虽不说是权倾一方，举足轻重，却也可以说是份量颇重的。他是勃兰特三名私人助理之一，有相当多的机会可以接触高级国家机密。勃兰特对他也非常信任，无论公务出访，还是私人外出，都把纪尧姆带在身边，他的活动日程也由纪尧姆插手安排，按照一般的政治常识，政府总理的活动日程本身就是一种机密，且不说在与总理阁下密切交往之中会接触到多少总理本人的私生活直至重大政治机密。而这一切，作为情报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敌方手中，其影响、意义、作用都是不难判断的。无论是在哪个角度上看，可以直接接触到总理本人和他周围的隐密是间谍所追求的极致。他既可以利用能够看到听到的一切材料提供给东方有价值的信息，又可以运用自身的影响，对总理的决策产生影响。这也就是东德国家安全部情愿让纪尧姆从默默无闻开始干起，一熬十几年，终于熬到成为勃兰特亲信的真实目的所在。

撇开纪尧姆进入总理府之前的数年经历不说，就是1969年10月21日勃兰特任总理开始，纪尧姆被国防部长奥尔格·勒伯尔推荐给勃兰特，直到纪尧姆1974年4月24日被捕为止，这段时间对一个政治家来说也不算短了。在此期间，纪尧姆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个给人以和蔼可亲、愉快开朗印象的纪尧姆，总是紧随勃兰特总理。他既让人知道他的存在，又不过分地引人注意，可以说是恰到好处。这非常有利于他工作的开展。以致于在得知他被捕的消息时，许多联邦议院议员互相询问谁认识纪尧姆，他们都见过这位手提公文包的矮胖的勃兰特办公室的第三号人物，但却都没

有太注意过他。

在勃兰特办公室里，他确实是个人物。他负责处理同社会民主党、教会以及各种专业协会的关系。每次勃兰特总理在社会民主党总部主持党的会议时，他都到场忙前忙后。勃兰特总理出行，无论是在“奔驰”轿车上还是在火车上，纪尧姆总是从早到晚陪伴在总理身旁，第一个向总理道早安是他，最后一个道晚安的也是他。即使是在法国南方或是挪威度假，纪尧姆也设法陪同前往。在频繁的公务活动中，在平常的社交事务中，他负责给总理提公文包，当然可以接触、经手大量的文件。在日常生活或者度假的闲暇时间，他陪总理谈笑娱乐休息，这样又可以在与总理交谈中捕捉有用的信息，并尽量地贴近总理的私生活。总之，他无所不在。只是有时殷勤得有些过分，譬如他经常长时间地等在候见室里，随时听候总理的调遣。这种殷勤多次出现在不同的场合，以致引得有些人感到有点讨厌。

在跟随总理的几年时间里，他工作得非常出色，兢兢业业，处处留意，处处小心，工作成绩斐然。仅就可以了解到的材料看，在四年中他至少为东方提供了如下情报：

有关社会民主党内的气氛，领导人之间的矛盾以及该党作出政治决定的方式；

有关维利·勃兰特总理与东德方面进行首次会晤前的准备情况；

有关联邦政府在同苏联和东德进行谈判时所要达到的目的以及联邦政府所下达的指示。在进行两次谈判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苏联和东德分别签订了条约。由于纪尧姆事先提供了情报，因此使东德的谈判人员成功地挫败了参加两个德国之间条约谈判的西德代表埃贡·巴尔所设置的圈套；

有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联邦国防军”的情况，以及尼克松总统给维利·勃兰特总理的一封亲笔信，在这封信里，尼克松谈到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的分歧以及他同米歇尔·若贝尔的会晤情况：

有关欧洲各社会民主党领袖之间就社会党同本国共产党关系问题的来往书信：

有关维利·勃兰特总理本人的精神状态和健康状况，以及他对各项事件的反应，他周围人的情况和他本人在其他各个方面的情况。

虽然这些远不是纪尧姆所获取得到的情报的全部，但是已足够说明渗透进权力核心的间谍的巨大作用了。难怪西方新闻媒介称他为二色的“鼯鼠”。他用了18年（从他涉足政界起）的时间，费尽心血，付出了大量辛劳，以极大的忍耐克制，终于获得大丰收。以致在事件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仍然津津乐道地谈论他。一说到成功的间谍范例以及所造成的政治丑闻，纪尧姆案例是一定会被反复提到的。

像纪尧姆这样一个出色的间谍，究竟是怎样取得成功的呢？人们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事件发生后，西德联邦反间谍机关、警察局和议会调查委员会曾进行多方调查，加上对案件的审理，终于基本搞清楚了这个由东方苦心培养的令人生畏的间谍所走过的路。

他的全名叫京特·卡尔·海因茨·纪尧姆，1927年2月1日出生在柏林市郊的一个小镇上，家中只有他一个孩子。父亲卡尔·恩斯特·纪尧姆是个才气平平的音乐家。母亲约翰娜是名理发师。他的童年不太为人所知，他童年时的朋友，上学时的同学似乎一个也找不到了，只是在他的事情揭出来后，才有一个他的不愿说出姓

名的同学向西德《明镜》周刊透露了一点零星的材料。据说，纪尧姆在上学时成绩最好，曾深得老师的赏识。

他14岁开始在照相馆当学徒，为他日后在西德站下脚根奠定了基础。17岁，纪尧姆学着十年前便投靠纳粹的父亲的样子，自觉自愿地加入了纳粹党，他加入那天是1944年4月20日，正值元首希特勒55岁寿辰，距希特勒垮台、二战结束也不很久远了。他对此事异常自得，曾把他的编号为970880的纳粹党证拿给他的好朋友汉斯·迪特尔·扎莱因炫耀。这段经历与他日后所作所为是很有其内在的联系的，而不能仅看作是年轻人的狂热与盲从。据扎莱因事后谈论起纪尧姆说，纪尧姆是个很会享受的人，工作勤奋，但不爱按时工作。他喜欢女人，也很能讨女人喜欢。纪尧姆的这位居住在西柏林的朋友对他做了间谍感到不可理解，当他在电视上看到纪尧姆的相片时，不禁大惊失色，他做梦也想不到他这位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学历的好友竟能跻身高层政治，做上了重要人物的顾问，更想不到他竟是一名间谍。

1944年，纪尧姆加入希特勒的青年党，之后不久，他加入陆军，直接投入了西部战线。1945年5月，他被英国人俘虏。由于战时的战俘管理比较混乱，几周以后，他逃脱了牢笼，回到柏林。战争结束后，柏林由美、苏、英、法四国共管，四个占领区之间没有什么相隔的篱笆，更没有柏林墙，人们活动不受限制。纪尧姆与朋友扎莱因居住在法占区里。最初，这两个年轻人想致力于海底摄影业，既是谋生，又是自己的爱好。当时柏林的报纸还曾报道过他们的计划。鉴于柏林当时的特殊环境，他们曾加入由加里·戴维斯领导的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的宗旨是实现种族平等，建立世界政府，公民都作为“世界公民”。但这一切，在纪尧姆的父亲突然从苏联前线归来之后都改变了，他原以为父亲早已死在什么地方了。这时，他搬

到了苏联占领区的肖里尔大街的父母家中，全家在苏占区住了下来。后来，他父亲由于找不到工作，又因不习惯战后新政权统治下的生活而感到绝望，1948年跳楼自杀了，时年43岁，纪尧姆21岁。

关于京特·纪尧姆为什么要在战后置正当营生不顾，而要投身于东德谍报机关，其起初原因恐怕无法为人所知了。有人说，战后他没有向有关机构交代他自己曾加入过纳粹组织，也许他忘了，也许他根本就想隐瞒起来，总之，是被人抓住了把柄，只好俯首就范。也有人说，他之所以要当间谍，是因为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弥补他父亲很早就投靠纳粹的过错，以及他自己为希特勒效劳的罪责。这些说法都不足以说明他当间谍的必然性。

至于他是何时参加间谍机关的，也是一个谜。一般的估计是在柏林被人为地分成两个部分前后。由于他居住在苏占区，也就自然而然地留在后来的东柏林。1949年，他成为德国—苏联协会的成员。一般认为，这就是他参加谍报工作的开始。纪尧姆常参加协会举行的会议，而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大的一家出版社“人民和知识出版社”任摄影师。该出版社发行教科书以及共产党的传单和宣传品。在这家出版社工作期间，他接受了一般性的间谍训练。间谍机关也对他的家庭背景、个人品质、性格特征、身世经历做了全面调查，大约觉得他是一个难得的间谍人材。于是，从1950年起，他便销声匿迹，实际上他是被送到苏联基辅接受严格正规的训练。这段时间，恰好在西方人手中的档案中留下了一段空白。在基辅，他掌握了无线电技术和其他种种传递情报的隐密方法；同时，还学会显微照相技术、密码、缩印文件等技巧。另外，他还掌握了心理分析法。这种方法，可以帮助他利用自身的优势给他人造成影响，利用别人的弱点施展自己的本领，以及如何获取某

种职业进而获得成功等等。受训之后，回到东柏林，他被提升为出版社的技术编辑，当上了工会代表。

也是1950年，他和一名机关职员克里斯特尔·博姆结了婚。不难想象，一个间谍的妻子应该是他事业的伙伴，他接受这一个妻子应该是和接受任务一样，来不得个人情感的自由发挥。尽管两人在性格方面、生活兴趣方面差异极大，如克里斯特尔是个正统的共产党员，情绪悲观、性格抑郁、生活俭朴；而纪尧姆则性格开朗、天生乐观、喜欢追求生活的乐趣。但这并不影响两人的结合，因为这由不得他们自己，克里斯特尔也是一名间谍，在东德的德累斯顿接受的训练。他们结婚以后，搬进了国家配给的家具齐全的崭新套间，在战争刚结束的艰难年代里，这可以算得上是相当特殊的待遇了。从这个时候起，纪尧姆接受的任务日渐多了起来，其中还有一些很特殊的任务，如让他把共产党的宣传材料定期送到西柏林的书店中去，并了解一些不很重要的西柏林书刊市场的情况。实际上，送不送宣传品并不是关键所在，关键是让他多多接触西方世界。当他的上司认为放出这只神密的“鼯鼠”的时机业已成熟时；他就要开赴他的真正战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了。

1954年底，纪尧姆被召到国家安全部，并被告知，他要立即到西德展开他的工作。由于当时东德还没有在西德设立代表机构，因此，他的一切活动除了妻子相助外别无帮助，必须单枪匹马，独自从零干起。万一出了差错，他是得不到援救的。给他的任务也很明确，就是设法打入当时还处于在野地位的社会民主党，尽量往上爬，笼络党员，并且帮助该党在竞选中获胜。

虽然纪尧姆对西柏林比较熟悉，但他对整个西德，特别是西德的政界是不熟悉的。为了很快地进入角色，适应新的环境，他先以公务身份到西德转了一趟。他留心观察了一些党派的代表会议，特

别是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情况。对西方式的多党制民主有了些感性体会,对各党派的政治主张有了大致的印象。他出席了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实地观察了慕尼黑冶金工人罢工。他还利用其余时间阅读西德的报刊,收听广播,进一步了解了西德社会现实。

另外,为了在西德社会中不显得格格不入,他还努力习惯西方的生活方式。为了涉足政界,他熟记了一些主要政治家的名字以及他们的嗜好,分析了各种政府以至民间机构的基本情况。到此时,他已做好了进入西方世界的一切准备。

要进入西德并完成使命,纪尧姆需要过两道难关,第一道是需要顺利进入西德而不被查出其真实身份,第二道是顺利加入社会民主党,过第二道关连他来自东方的事实也要加以隐瞒。过第一关在当时不算太难,东德人可以难民的身份进入西方。当时柏林墙还未砌起来,大量的东德人借机逃到了西德,1961年砌起柏林墙为止,共有350多万东德人跑到了西德。仅1955年一年,就有22.9万多人跑到西方。这个方法虽然便当,但对于间谍来说却不合适。因为所有从东方逃到西方的难民都要安置在几个专设的难民营里接受检查,这样间谍的身份就很难保不被查出。因此纪尧姆找到一个巧妙的掩护,他利用有荷兰国籍的岳母费拉·博姆作担保人向有关部门进行申请。费拉·博姆曾是共产党员,她利用丈夫获得了荷兰国籍,从而免去了一切检查。纪尧姆通过岳母作了妥善安排,找到了住所。为了不被西德有关当局注意,他的岳母于1956年7月3日向法兰克福附近的吉森难民营提出了女婿到西德的申请,却没有把纪尧姆自己写的申请信寄去。为的是试探西德机关是否注意了这个人,如果到9月份还没有任何动静,那就说明没有什么危险了。实际上纪尧姆在5月中旬已经过西柏林到了法兰克福。

到9月份，他发出了申请信，在信中他称自己“在那个布尔什维克国家里感到不自由，同时又很难掩饰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当然就足以获准安居下来。在法兰克福，他们夫妇像普通西德公民一样生活起来。先是开办了一个照相复制胶版复印所，后来又在一家出售巧克力、烧酒和烟丝的杂货店工作。他给商店老板留下的印象是“为人和善，富有教养，从早到晚忙碌在柜台边”。这时候，他们夫妇已在社会中站稳了脚跟。

在这期间，纪尧姆设法与东德接上了关系。在他儿子出生时，西德反间谍机关曾截获了一份发自东方的奇怪电报：“祝贺你有了第二个人。”当时人们还很难想象到这就是东德间谍与纪尧姆接上头的标志。一年以后，纪尧姆夫妇正式申请加入他们所在街道的社会民主党支部。这样，他就碰到了第二道难关。

按照社会民主党的原则规定，来自东德的人申请入党要填写专门的表格，这些人的申请必须经过审查。纪尧姆干脆根本不说自己是从东德来的，免去了可以暴露难民身份的诸多麻烦。直到纪尧姆被捕以后他的顶头上司才知道他这个忠诚的社会民主党员原来是东德难民。当然，一个德国民族的人仅从表面上是看不出谁是东德人，谁是西德人的。有意思的是，东德的间谍机关负责人米沙出生在西德的斯图加特，而西德的反间谍机关负责人恰巧出生于东德的莱比锡。

西德的社会民主党当时不十分景气，在西德政治生活中并不占很重要的位置，而且也不是执政党。当影响了全欧洲各个社会民主党命运的“哥德斯堡纲领”公布之后，西德的社会民主党受到了很大震动，“纲领”在它的内部引起了很大动荡。社会民主党正是根据这个纲领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整个党向右转，从而终于在1969年取得了执政党的地位。而这正是纪尧姆孜孜以求的目标，他可以

抓住时机大大施展一番了。此时东德方面的思想意志可以通过他的努力而悄然无声地影响西德的政治了；同时他可以把执政党的决策机密送回大本营。他曾把社会民主党左翼“叛徒们”的名字告诉东方，以便能够准确掌握这个党的人员状态。另外，为了使已向右转的党的领导人加深对他的印象，他还不停地在德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内部制造混乱，使得有明显左倾思想的青年团主席十分讨厌他，说他最好还是去参加右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

纪尧姆一直注意不要表现得太过分，他在地方分部只做些日常杂务，如在党的会议上摄一些照片供《社会民主党人报》刊登，或者张贴布告或散发宣传品。他妻子与他相比倒显得更为活跃，她是社会民主党南思森分部主任、以后是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议员的维利·比克尔巴赫的私人助手，在党的代表会议上可以和代表们平起平坐。所以，人们一般觉得纪尧姆只是一个“在老婆石榴裙下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实际上，人们不可能知道正是这个不经常抛头露面的纪尧姆，他呆在家中是为了按时收听广播，以便接收随时可能发给他的电报。

经过4年多的兢兢业业的工作，就在柏林墙建成后不久的1961年，他开始脱离了默默无闻的辅助性工作，担任了社会民主党北法兰克福分部副书记。3年后，他又当上法兰克福区分部书记。他一直很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但有一次，他出了个小小的错误，在一次地方分部党的会议中，他曾提着一架价格昂贵的瑞典制造的“林霍夫”牌高级相机在会场上走来走去，以他这样一个收入不多的党的小干部来说。这部相机在当时是过于奢侈了，但当时却没有人注意这种不协调意味着什么。还有一个小的差错主要责任不在他，一个经他介绍安排了工作的“女朋友”不久与她丈夫一同被捕。经审查，他们都是东方情报机构的情报人员。纪尧姆因此被

召去作证，他巧妙地消除了人们对他的猜疑。除此以外，他没再出过其他错误，应该说，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多年的辛苦终于要得到报偿了，纪尧姆在西德政界的地位已经确定，他结识的方方面面的人物都将在他今后的政治生涯也即是他的间谍生涯中相助于他。随着他日益接近权力核心，他所能提供的情报的价值也愈见高涨，东德方面也更加器重他。当初刚赴西德时，他也许只是千百名间谍中的一个，而这时，他已是屈指可数的人物了。

1966年，纪尧姆有幸10年来第一次回到柏林。他随同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分部组织的游览团去柏林二日游。在西柏林，他们先是参观隔开同一德国民族的柏林墙，然后出席当时的西柏林市市长维利·勃兰特，即日后的勃兰特总理举行的招待会，这便是他第一次与勃兰特会面。当然，匆匆一面两个人都不会有太深印象，他们更想不到以后几年里他们的命运会那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第二天，纪尧姆借西德人可以自由前往东德游览的便利，与同伴打了个招呼，说是去“看望亲戚”，然后前往东柏林，实际上，他是离开东德十年后首次去听上司面授机宜。这次同总上司米沙·沃尔夫的晤面，决定了他日后的命运。也许谈话很重要，因而时间拖得过长。同伴们看他一直未归，觉得不太正常，就向有关当局做了报告。但是几个小时后，他回来了。面对同伴疑惑的面孔，他神态自如地说“这是由于边防检查站的错误”。这样的话当然是令人信服的，人们对东德方面检查向西走的人苛刻严格是不感到新鲜的。

1966年时的社会民主党正一帆风顺，民众对这个党的信任程度日益提高，这与社会民主党务实的工作作风有密切关系，同时，民众对执政20年的右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已不太喜欢。执行较温和方针的社会民主党自然受到了民众的欢迎。而基督教民主联盟

自己都已感到精疲力尽了，便有意愿地把反对党人士结合进政府。在施政方针上，也更多地参考反对党的意见。维利·勃兰特就是在这个时候担任了联邦政府的外交部长。勃兰特出色的政治家才华使他声誉日盛，许许多多的人乃至国外的政治家都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的关于东西方和解的主张赢得极高的声誉。社会民主党人战后第一次看到了夺取执政党地位的希望。他们的主张，他们的方针，更加符合历史演进的潮流，更符合人民的愿望。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东德人加紧敦促纪尧姆跻身高层，多年的忍耐静观就要一改而成主动进攻了。

就在纪尧姆快要成功的时候，他遇到了小小的麻烦。当时他在北法兰克福选区的议员、现任财政部长的流斯·马特赫费尔看不惯他，认为他是“思想狭隘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气味十足的社会民主党员”。议员先生的成见对他不利，弄不好会前功尽弃的。纪尧姆决定搬迁，经过认真选择，他决定搬到泥水匠出身的议员格奥尔格·勒伯尔所在的南法兰克福选区。勒伯尔是工会活动积极分子，为人正直、淳朴，在选民和政界里均有较高的声望，有希望当选为政府部长。投在他的选区并博得他的信任就会有利于纪尧姆的全部计划。凭纪尧姆的精明强干，他很快就赢得了勒伯尔的信任。他跑遍了选区的每一条街道，有时和勒伯尔一同到选民中去，有时他一人单独活动。后来，勒伯尔轻而易举地当选了。

1969年10月21日，维利·勃兰特当选为政府总理，社会民主党正式取得执政党的地位，直到1972年社会民主党再次以压倒多数竞选胜利，都是社会民主党和勃兰特（作为党的主席）最为辉煌的时候。在那以后，社会民主党就开始受到在野党越来越多的攻击和来自民众的不满批评，这是后话。当时，格奥尔格·勒伯尔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纪尧姆也跟着走红。新的政府缺少来自社会民主